

## 胡瑗经学思想与庆历学风的转变

○ 朱广龙

(浙江大学 哲学系,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胡瑗是宋代著名的思想家,本文试图通过解读胡瑗经学思想,并结合宋代儒学的形成时期——宋仁宗庆历年间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叙述这一阶段使宋学学风发生重大转变的三股思潮:疑古、义理与变革,并浅析这三股思潮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内在逻辑及其对以后儒学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宋学;疑古;义理之学;变革

### 一、宋初儒学面临的挑战

学术界一般所谓“宋学”,乃是对宋代儒学的简称。著名学者漆侠先生在他的遗著《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书中,非常敏锐地指出过去宋学研究存在着两个偏向,其中之一是“用理学代替宋学”。<sup>[1]</sup>这一问题在学术界确实早已存在,最早可以溯源至黄宗羲,他大力批驳后世冠以程朱陆王之学“道学”之名,认为《宋史》“儒林”、“道学”分为二传是客观上强行对儒家学术“大一统”的割裂,其害不浅。其子黄百家继承父说,在《宋元学案》中写下这样一条按语:“十七史以来止有儒林,至《宋史》别立道学一门在儒林之前,以处周程张邵朱及程朱门人,以示隆也,于是世之谈学者动云周程张朱,而诸儒在所渺矣。”<sup>[2]</sup>深刻地揭露出所谓“道学”或者“理学”在宋学学术史研究中喧宾夺主的客观事实早已有之。对于“儒学”与“道学”的名分之争,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也提出过类似于黄氏的看法。但长久以来理学在宋明学术研究中的主流地位一直巍如泰山,以至

---

作者简介:朱广龙,浙江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研究主题为朱子后学黄榦思想研究。

于这种偏颇始终未能完全消除。

可以说,自黄宗羲提出这个问题以来,其客观存在久已引起宋学研究者的关注,自近代以来,在梁启超、何炳松等学术大师的引领下,不少学者以史学研究方法对王安石、浙东事功学派进行了新的诠释。而荆公新学研究和浙东学派研究的兴盛,为我们提供了多元解读宋学的途径,也启迪着我们摆脱固有偏见,全面看待有宋一代各儒学学派彼此之间的异同、竞争与消长关系,从整体上把宋儒的学问作为儒家经学学术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抓住宋学作为对汉学的一种反动——这一特点来阐述宋儒的学术成就。

何为宋学?邓广铭先生在《略谈宋学》中指出:“宋学是汉学的对立面,是汉学引起的一种反动。”<sup>[3]</sup>漆侠先生进一步认为:“宋学是以义理之学代替了汉学的章句之学的。”<sup>[4]</sup>

这里汉学与宋学作比较是从治学的方法论而言的,汉儒治学,不得不面对经历了焚书坑儒以及由秦入汉以来语言文字迅速演变所造成的经典严重流失散佚这一严峻现实,实事求是而论,汉代经师们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在训诂注经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考据学方法,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汉代章句之学存在着三大弊病:1. 家法森严,众多皓首穷经的儒生们在表面上强调师徒传承的掩盖下,拘泥于门户之见而自以为是,这种墨守陈规、固步自封的学风对经学的发展构成了严重的阻碍。2. 繁琐附会,以穷篇累牍之文注一二字之经,这也是汉代经学发展过程中一种愈演愈烈的不良风气,以至于许多儒士空有经师之名而不解儒经大义。3. 讖纬迷信,自从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后儒变本加厉,阴阳五行与讖纬学说大兴,使儒家学术几乎无异于巫术神学。显然,有着这三大重症的汉代经学逐步失去了儒经的本意,流弊甚深。

对于汉学的弊端,在汉末早已有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有所体会,并在自己的求学过程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突破,漆侠先生《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中举诸葛亮游学时“独观其大略”的典故对此做了极其精当的说明。<sup>[5]</sup>然而这种突破仅仅是个体意义上的,它没有形成一种被普遍认可的风气。

于是自汉至唐末宋初,儒学逐渐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就儒家内部而言,自隋朝科举制实行以来,经学领域里沿袭汉代拘泥章句的琐碎学风并未见好转,贞观年间,唐太宗召命孔颖达、颜师古等人作《五经正义》,唐代以其书为科举考试标准,孔氏等人的“义疏派”在注经上并无太大的创新,大部分因袭汉学,对章句、讖纬、天人感应等弊说也没有做多少修正,这种日渐僵化的解经思想直接影响到唐代知识分子对儒学的认同感。就儒家之外而言,自魏晋以降,老庄玄学盛行,士人崇尚清谈,然后佛家也加入了这一潮流,晋朝高僧如支道林等皆是清谈场中高手,他们借着老庄玄学的话题发挥佛教经义,佛道崇虚,两教虽旨趣大异,但这时却统一于玄学与清谈的旗帜下,一起在士族知识分子中争取市场,自然而然地排挤了儒学。儒家学问历来偏重于道德伦理、政治哲学,而在形而上的层面上,论及“天命与性”则较贫乏,比起佛道二家,尤其是佛家精致完备的理

论体系来自自然是相形见绌。再加上唐朝历代君主对佛道两教大致上都是扶持有加,更是加重了这两家学说对儒学的外部压力,这就是所谓外患。面对这样的困境,韩愈李翱等人以复兴儒学自任,对内提倡“道统”、“复性”,对外大力排佛,为儒学复兴奠定了基础,为宋人应对儒学内忧外患所采取的手段埋下了伏笔。

那么宋儒是如何继承韩愈等人的思路,来应对儒家内忧外患的呢?个人认为首先是对自汉以来注经方法的怀疑和否定,进一步而言,跳出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门户,不再拘泥于辞章训诂之学,而是用一种理性的方式,转变为“我注六经”的义理之学。这种义理之学,结合儒家经世济用的一贯精神,以及宋代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就产生了宋代知识分子对于变革的空前热衷。钱穆先生曾把宋儒治学的精髓概括为:“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sup>[6]</sup>他所论述的这两种宋学精神,初步形成于胡瑗等“宋初三先生”所活跃的庆历年间,宋学精神的初步成型,可以说是宋代学术在学风上对汉以来学术的突破。

## 二、胡瑗学术概要

胡瑗(公元993-1053年),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祖籍陕西安定堡,人称安定先生,北宋著名教育家,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早年苦读于泰山,《宋元学案》记载“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sup>[7]</sup>胡瑗熟谙经史、精通音律,于湖州教学数十年,以身作则,严师徒之礼,立“经义”、“治事”二斋,形成了以“明体达用”著称的湖学,庆历年间仁宗采纳范仲淹“精贡举、兴学校”的建议,召令取法湖学,“著为令于太学”。明代程敏政评价:“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胡瑗不仅长于教育,在经学上也是成就斐然,《四库全书》存其门人所辑录《周易口义》十二卷、《洪范口义》二卷。他的学术思想,主要见之于这两部著作。后人全祖望评价:“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sup>[8]</sup>

胡瑗是宋代义理之学的先锋,他的经学思想通过教育和学术两个方面,对庆历年间宋学形成时期学风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谓开一代之先河。其弟子刘彝评价他的主要思想时说:“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sup>[9]</sup>陈来先生在《宋明理学》中对此阐发为:“体是指价值原则,文是指经典体系,用指将体、文措之于社会时间以发生效用。”<sup>[10]</sup>胡瑗的体用之学对二程的道学影响深远。他所一手创办的湖学即以“明体达用”而著称一时,后来又通过太学取法苏湖教法而更加得以推广,他立“经义”、“治事”二斋对学生进行体、用两方面的教育,这不仅仅只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对他哲学思想的注解。表面上,“体、用”二者分离,但从更深的层面上来说,“明体”是内圣之道,“达用”是外王之道,在儒家,内圣和外王不是分

离的,而是统一于同一个目的,即经世致用。

对于胡瑗注重义理之学的学术倾向,蔡襄评价其:“为文章皆傅经义,必以理胜。”<sup>[11]</sup>《四库全书·洪范口义提要》也认为:“瑗生于北宋盛时,学问最为笃实,故其说惟发明天人合一之旨,不务新奇……驳正注疏,自抒心得,以经注经,特为精确。”<sup>[12]</sup>他对《周易》的解读尤为后人所重,他的易学重义理而“不论互体”、“于象数扫除尽略”。在解《易》的体例和学风上,胡瑗《周易口义》继承和发扬了王弼的《周易注》,同时又旗帜鲜明地对王注多以老庄之理解《易》进行了摒弃,用儒家理论为尺度,以内圣外王为主旨,在儒家解《易》中属于义理学派的开山之作,我们可以从程颐的《易说》中看到他与胡氏解易衣钵相承的关系。

下面就《周易口义》略述胡瑗的学术成就及其影响:

### 1. 怀疑并突破前人的注经方式

北宋掀起的疑古疑注之风,以欧阳修为代表,欧氏与胡瑗同代而略晚,他对《易传》进行了十分大胆的怀疑,但这种怀疑并不完全合理,早有学者指出宋儒对前人经注有“疑古过勇”之嫌<sup>[13]</sup>。胡瑗在对前人经注的怀疑上态度相对保守,但不可否认,他也参与在这股疑古思潮中,对于汉朝以来儒士解经溺于辞章注疏之学导致不解圣人大旨的学风加以批判。并通过他作为经学家和教育家的双重实践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周易口义》虽然继承前人的成分较多,但也长于另立新说,颇能突破前人藩篱。

#### a. 关于“周易”之“易”的解释,《周易口义发题》记载:

“然谓‘易’者,按《乾凿度》云:‘易一名而舍三义,简易也,不易也,变易也。’故颖达作疏洎崔颢、刘正简皆取其说。然谓不易、简易者,于圣人之经谬妄殆甚,……况圣人作易为万世之大法,岂复有二三之义乎?按扬子曰:‘阴不及则阳不生,乱不极则德不形。’又《系辞》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又云:‘生生之谓易。’是大易之作,专取变易之义,盖变易之道,天人之理也。”<sup>[14]</sup>

《易纬乾凿度》这种所谓“一名三义”的解释,乃是汉代经学家沉溺于章句家法,妄加牵强附会的烦琐学风的典型体现,胡瑗在此以卓有见地的眼光对其进行深刻的批判,对后世影响极大。曾受教胡瑗于太学的程颐在《易传序》中继承此说并进一步阐发:“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sup>[15]</sup>此后宋代学者大多都只取变易一理,自觉地对“一名三义”说加以排斥。

b. 关于“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王弼与孔颖达都根据《文言》所述,对“勿用”解释为“不用于世,穷处于下。”但胡瑗对此不以为然:

“勿用者,圣人戒后世勿用此潜龙为德也……夫有圣人之资,则无所不通,无所不明矣,固当出现于世,辅其君,泽其民,利其物,以成天下之物可也……孔颖达作疏,以谓‘勿用’者,于此时小人道盛,若其施用则为小人所害,此大非圣人之旨。”<sup>[16]</sup>

在这里,胡瑗并没有迷信《文言》对“勿用”所作的解释,非常明显,他是拿孔

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精神作为解释尺度的,他的义理之学在这里就明显地表现出“我注六经”的理性精神,以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作为依据,对于传统儒家经典中不合乎自己所认同的积极入世精神的文本,表示了间接的怀疑和否定。

c. 关于《易经》为何分上下两篇,孔颖达《五经正义》因袭《易纬乾凿度》之说,以为《易》上篇三十卦法阳,下篇三十四卦法阴。又,乾、坤为阴阳之始,万物之本,故为上篇之首;坎、离为日月,所以终始万物,所以为上篇之末。咸、恒是夫妻之道,所以为下篇之始;既济、未济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故为下篇之终。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并不严密,有相当大的牵强成分。所以胡瑗对此不以为然,认为:

“先儒亦常谓:不分之即无损其义,分之亦无害于其实,但以简帙重大而分之也。”<sup>[17]</sup>

此外,对于《易传》中《系辞》分上下篇他也有类似的不同意前人的观点:

“按上《系》、下《系》之说,先儒议者多矣。何氏则曰:上篇明无,故曰‘易有太极’,下篇明几,故曰‘知几其神’。或曰:上篇论《易》之大理,下篇论《易》之小理。皆失之。盖以简编重大,故分上《系》、下《系》也。”(同上)

胡瑗的这种说法虽然并没有确切的考证,但上述两个问题并非有关于大旨,所以他这种朴实明了的解释较前人烦琐而附会的说法显然更加简明扼要一些。这也是他所提倡的义理之学对于汉朝以来章句之学的突破。

## 2. 以儒家义理为本的注经模式

胡瑗以义理为本的注经模式代表了庆历年间宋儒中间兴起的一股新风尚,体现了庆历年间宋儒诠释儒经的大势所趋。这种义理究其根源,正是儒家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伦理,胡瑗以这种君臣大义为解经依据,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对于实现“三代之治”和规范社会政治秩序的热衷。在胡瑗讲授《周易》时,经常使用“引史证易”的方法来诠释义理,这是由于他的《易》义理之学不仅继承王弼明天道而注重人事的传统,更视《周易》为管理政治、经世济民之书,故常以历史人物、历朝政事的功过得失来解说卦辞与爻辞。

试以胡瑗在“节”卦中所论述的儒家伦理:尊卑贵贱与中庸节制来加以说明。胡氏在《周易口义》中论述“节卦”时,对于儒家伦理纲常的阐述可谓不遗余力:

“然谓之节者,使父子有礼,上下有等,男女有别,尊卑有序,长幼有伦,夫妇有制,内外有分,皆有所节……贤不肖各有所处,士农工商各守其业,富贵贫贱各当其分。如此之类,举而言之,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有所节。”<sup>[18]</sup>

又提出行中庸之道是实现“各有所节”的途径:

“所为节制,得其中,又得其正。得其中则无过与不及之事,得其正则不入于私邪,是中正所为之道,可以通行万世,使天下得尽所以为节制之义也。”(同上)

## 3. 胡瑗易学思想与庆历新政

a. “剥”卦——胡瑗论民本思想与变革理论。胡瑗在对“剥”卦的解释中尤

其强调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和要求变革的忧患意识,民本思想一向是儒家传统所倡导的,他指出:

“盖国以民为本,本既不立,则国何由而治哉?夫民者,君所赖为本也,在《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sup>[19]</sup>

接着开始评议时政:

“今小人在上,肆其奸恶,夺民之财,困民之力,使之舍安而就危,去存而即亡,怨气交而上下不通,是其本已弱矣。”(同上)

由此可见胡瑗对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弊病有着多么深刻的忧患意识,有忧患就会寻求解决之途,精研易理的他自然深刻明白“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虽然胡瑗没有直接卷入当时庆历新政的政治核心,但作为范仲淹在学术和政治上的知交,他一直在经术理论和教育方面为改革提供理论上和舆论上的依据,下面一点要论述的“损”、“益”之道也是胡瑗的一种政治改革理论。

b. “损”卦与“益”卦——胡瑗论损益之道。《宋元学案·安定学案》附录有一条转录陈右司云:“胡先生在迓英,专以损上益下,损下益上为说”。<sup>[20]</sup>可见胡氏在迓英殿为宋仁宗讲《易》时,经常很有针对性地论述“损”与“益”的辩证关系,我们来看一下他是如何论述这一学说的。

“损”卦:“大凡居上者,不可常损下以益己。”<sup>[21]</sup>

“益”卦:“凡物之理,盛极必衰,损久必益。益者,损上以益下,损君以益民,明圣人之志,在于民也。然损下益上,则谓之损者,盖既损民之财,又损君之德也。损上益下,则谓之益者,盖既益民之财,又益君之德也。”(同上)

这种理论绝对不是空洞说教,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联系北宋初期就开始表现出来的国内积贫积弱,对辽、西夏用兵又屡战屡败,不得不纳币求和的双重弊病,我们就会发现,胡瑗这种“损益之道”的理论实际上在规劝仁宗皇帝励精图治,通过变革来解决社会矛盾,以达到长治久安。这可以说是在学术上对范仲淹等人的庆历新政遥相呼应。

### 三、胡瑗与宋学学风的转变

胡瑗等宋初三先生所活跃的庆历年间是宋代学术的第一个高潮,漆侠先生认为:“宋仁宗统治期间(庆历前后)为宋学的形成阶段,其代表人物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和李觏、欧阳修,而以范仲淹为核心人物。”<sup>[22]</sup>在这个百废待兴的历史时期,一股富有理性主义和批判色彩的儒学新风开始荡涤陈说,为儒家经学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个人认为,这股革命性的新学风可以概括为三大思潮:疑古、义理和变革。三种思潮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在庆历年间可谓是一时风靡,为此后宋学的进一步发展成熟扫清了障碍。

首先阐述北宋庆历年间的疑古思潮。儒家经典由于年代久远,又经历了焚书坑儒之祸,早已真伪混杂,汉朝即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宋代对于儒家经典最旗帜鲜明地加以怀疑的,当数欧阳修,他在《易童子问》一书中对于“五

经”之首的《周易》进行了大胆的怀疑,认为“何止《文言》,《系辞》而下,皆非圣人所作。”<sup>[23]</sup>《周易》作为卜筮之书,是儒家经典中唯一幸免于秦火的,又是儒家“五经”之首,《周易》尚且如此,更何况经历秦火之灾洗礼的其他儒经呢?欧阳修的怀疑未免有“疑古过勇”的偏颇,但宋人这种疑古的思潮,实际上是当时儒家知识分子们对于汉代章句之学不满而表现的一种较为极端的形式,也体现了宋儒在学术上超唐越汉,直追三代的勇气和革新精神。何炳松先生在《浙东学派溯源》一书中也对此表示了肯定:“此地有一点却值得我们注意:他们好像已经是离开了经今古文的门户,各自用一番独立研究的工夫。宋学所以能够在我国的学术史上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而且所以能够在比较的短期间产生出这样伟大的效果,这种前无古人另起炉灶的决心恐怕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sup>[24]</sup>

如前所述,胡瑗等宋初三先生所活跃的历史舞台,正是宋代儒学发展的第一个飞跃时期,儒家处在内忧外患的交攻之下,这些有识之士们在学术上表现出了越汉唐追三代的勇气,以重续道统,“为往圣继绝学”为己任。他们的治学方法,已经开始摒弃汉唐儒士严守家法、溺于章句注疏的路子,而以一种富有理性主义色彩的方式来解读、诠释儒家经典,寻求内圣外王之道。宋代学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理性主义的高扬,决定了宋儒在经学和哲学上的高起点,这种理性的精神首先表现为对前人学问的怀疑和批判,进而对于儒家经典本身进行部分的怀疑。对前人学术不满,并且由此产生超越前人,不再拘泥于前人藩篱的勇气,这必然会产生怀疑,怀疑是批判的前提,在批判的基础上重建,这种由怀疑引发批判再到重建的过程,是宋儒对自我理性精神的肯定,理性高涨,以胡瑗等人代表的宋儒致力于探究圣人的“微言大义”,重义理而略章句的新学风由此兴起。

这种新学风本于这样一个逻辑前提:圣人的境界可以学而至之。胡瑗在《论语说》中,对子贡言“夫子不可及”之论大加驳斥,认为:“子贡之言,甚而言之也,孔子固学于人而后为孔子。”<sup>[25]</sup>黄宗羲对此评价说:“子贡辟毁孔子者,故极言之,安定恐后学待孔子太高而自绝于不可学,故又为之说如此。”<sup>[26]</sup>可见以胡瑗为代表的宋初儒士已经初步形成了“圣贤气象”可以学而至之的坚定信念,这也更能体现出宋人在治学上对于“内圣”的自家功夫方面的追求。

据《宋史》载:胡瑗在太学,以“颜子所好何学”为题试诸生,时程颐游于太学,以“学以至圣人之道”为文作答,阐发“圣人可学而至之”的道理。胡瑗得其文,大惊异之,即延见,处以学职。<sup>[27]</sup>胡瑗用这个题目来考试学生,其中本身就包含着他对“颜子之学”的推崇,把它作为章句之学的对立面而加以倡导,程颐在文章中明确地阐明了对“学作圣人”的追求,大合胡瑗意旨,故胡氏“处以学职,知契独深”。我们可以进一步把胡瑗所代表的宋初儒士的这种“圣人可学而至之”的追求与前代知识分子作相关比较,据《世说新语·伤逝》:王(戎)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sup>[28]</sup>王戎的寥寥数语颇能反映晋人追求和注重个人洒脱与旷达的心态,所谓“放浪形骸”、“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并不否认“忘情”的圣人是道德上的至善,但对自身则更重视“真性情”,而就其治

学的态度而言,大致认为一个“情之所钟”的平凡人,是不可能学而至圣人境界的。相形之下,胡瑗等宋代知识分子的态度较为高迈和积极。正是这种积极理性的态度,成就了庆历年间宋学在学风上实现重大的转变。

宋儒的坐而论道绝不是纯粹的学术上的目的,正如何俊教授所言:“宋儒的目的是要为个人与社会建立一个良性秩序”。<sup>[29]</sup>学而优则仕和经世致用历来是儒家的根本精神,宋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是强烈的,具体到北宋庆历年间,当时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问题和对外的软弱无力开始显露端倪,一方面,社会的内忧外患对学风的转变起到了客观的促进作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普遍抱负体现他们自我肯定的意识,胡瑗等宋初三先生对儒经的诠释开始体现“我注六经”的精神,“我”的凸显尤其明显的表现为由“内圣”为途径而致“外王”,以学做圣人作为心系天下的有效手段。而另一方面,经学、哲学上的突破与变革为社会政治上的改革做好了理论的准备,庆历年间的政治改革也由此而登上历史的舞台。

虽然出于各种原因,庆历新政夭折了,但其“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因胡瑗的执掌太学而得以延续,而之前的所谓疑古、义理、变革等思潮在经历了庆历年间兴办学校以及革新政令的运动以后,已经在宋儒的学术中发扬光大,可以说,经过以胡瑗为代表的宋初儒士的努力,儒学学风的转变最终在庆历年间较为圆满地完成了。

### 注释:

[1][4][5][11][22][23]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4、4、242、7、199页。

[2][24]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2、115、116页。

[3]邓广铭:《略谈宋学》,收录于《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页。

[7][8][9][20][25][26]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三册,《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5、55、57、61、58、58页。

[10]陈来:《宋明理学》(第二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12]《四库全书·洪范口义》提要,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影印本54-452。

[13]王世舜:《论宋儒的疑古精神及其历史意义》,收录于《宋明思想和中华文明》,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44-54页。

[14][17]胡瑗:《周易口义》发题,《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影印本8-171、8-172。

[15]程颐:《易传》序,《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影印本9-157。

[16]胡瑗:《周易口义》卷一,《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影印本8-184。

[18]胡瑗:《周易口义》卷三,《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影印本8-271。

[19]胡瑗:《周易口义》卷五,《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影印本8-287。

[21]胡瑗:《周易口义》卷七,《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影印本8-354。

[27]见脱脱等:《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六·道学一·程颐传》。

[28]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

[29]何俊:《南宋儒学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